

有人觉得公益机构“就不该要钱”，民办非企业单位纳税税率却与企业相当

青年社会组织“半死不活”事出有因

前沿

本报记者 王烨捷

记者近日获悉，今年的上海市两会上，团上海市委、上海市青联界别以小组名义向上海市政协递交了一份提案《关于优化政府购买青年社会组织服务相关政策的建议》。（下称《建议》）《建议》尖锐地指出，目前上海青年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微妙”关系——购买青年社会组织服务的政府部门较少，集中在共青团、民政部门及部分街镇；购买服务的范围较小，往往被限制在公益、文化等相关内容；购买服务的额度（费用）不高，一些购买忽略人头劳务费用；购买过程还存在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制约。

受团上海市委委托，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师童潇撰写《建议》。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过去一段时间，他与数十家在沪青年社会组织的负责人“聊天”时发现，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是——这些青年社会组织虽然“小有成就”，但他们的生存状态却更趋于“半死不活”。

上海共青团组织是全国较早针对青年社会组织喊出“服务”口号的共青团组织。早在2006年10月，团上海市委就成立了旨在帮扶青年社会组织的上海青年家园

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开始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类似“机构注册”的便利。如今，在民政部门放开机构登记注册之后，团组织又敏锐地感受到，青年社会组织生存、“社会参与”仍需“查遗补缺”。

做公益开票缴税5.65%， 企业所得税25%

税收，是摆在每一个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机构）的社会组织面前的一道坎儿。

1998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将民办非企业单位界定为：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然而，定义虽然是“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却不得不按照“企业标准”来缴税。

上海向阳花青年公益社创始人孙冰告诉记者，他每向资助者开一张服务性行业票据，税率是5%，另外还要支付教育附加、河道清污等附加税，共计5.65%。这笔开销对孙冰而言只是一笔“小钱”，真正的大头是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

知》，社会组织因政府购买而获得的收入，仍需纳税，税率为25%。这笔钱，每一家社会组织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合理规划”。

在团上海市委向政协递交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很多社会组织变相增加项目预算，被迫‘做假账’问题”。

孙冰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苦衷。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一个项目的服务期限一般为一年，而政府方面的付款方式则为一次性付清一年款项或者分两次付清全年款项。但税收审计则是3个月一审。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家社会组织的账目，在年初和年底各级机构打账付款时会有大笔进账，看上去是“超额盈利”；但在年中6个月里，却分文未进。那么，这税还要不要缴？孙冰所在的向阳花公益社，明码标价，会向项目捐助者收取费用总额10%的管理费，这其中还包括5%左右的开票费，剩余的经费大多用来维持机构内部的行政运行、业务成本等。

团上海市委的《建议》道出了“向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民非机构课税”过程中的矛盾——政府觉得公益机构应当回避营利性要求，只给很少的项目经费；但在税收方面，政府购买又被当作营利性内容来处理，认为这是社会组织“增值”所得，和企业（商业）组织营利所得、增值税收处理没有任何区别。

把奇思妙想变成现实 深圳：“创客”文化潜入学中小小学校园

本报记者 武欣中

4月15日下午4点40分，下课的铃声一响，深圳中学初中部的学生们就迫不及待地跑到了广场上，一时间，机器人、粉尘爆炸器、电子炮、弩、电子闪光灯……这些同学们自己创意、制造出来的产品成了校园的主角。

这是深圳中学初中部首届创客节的现场。除了学生们自己打造的这些创意产品，包括深圳知名创客机构——柴火创客空间在内的16家创客单位、6个学生创客社团也前来“摆摊”助兴，3D打印机、谷歌眼镜、李克强总理在柴火创客空间视察时体验过的创客产品，都赚足了学生的眼球，吸引他们排起长队前来体验。

“创客”一词来源于英文单词“Maker”，是指出于兴趣与爱好，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近年来，数以千计的创客活跃在深圳的各个角落。柴火空间、创客工场、矽递科技等创客机构在国内外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今年1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来到深圳“柴火创客空间”考察，更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创客”文化热潮。

这股热潮，也早已悄然潜入深圳的小中学校园。

2013年，还在读初一的深圳中学初中部学生郝宇焜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全球创客马拉松深圳站比赛，他们的“新式答题卡扫描器”还获得了这次比赛的导师奖。

“当时学校成立了一个叫做奥罗拉工作室的课外学习组织，我们几个都是智能组的成员。”如今已是初三年级学生的郝宇焜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发现，考试时用2B

铅笔涂答题卡，而答题卡扫描仪判断题目的方式就是检测上面的碳含量，有时候机器产生误判，分数就莫名其妙没了。他们于是萌生出一个想法：制作一个光学扫描仪，通过扫描答题卡上面光的亮度来提高扫描的准确度。他们带着自己研制的新式答题卡扫描器参加比赛并获得了评委给出的满分。

或许是通过这次参赛让学校管理者感受到了“创客”的魅力，2014年6月，初一学生胡睿博提出创办一个创客空间的设想时，立刻得到了校方的积极响应，还专门为他们提供了场地。自此，不论是午休期间还是放学后，这个十几平方米大小的星火创业空间成了校园小创客们最爱的地方。

在学校的赞助下，眼下，星火创业空间已经有了台钻、手枪钻、电锯、电烙铁、万用表、螺丝刀等60余件工具，虽然与专业创业机构相比，这些工具还显得相当简陋，但同学们却研制出“粉尘爆炸器、电子炮、弩、电子闪光灯”等一批创意产品，10多名同学还参加了国内外各种不同形式的机器人比赛、创客比赛。

“其实我们很多创意都是来自自动漫”，胡睿博说，能把一个奇妙的想法变成产品，这个过程让他着迷——有一次，为了完成一件作品，他在这里一直“加班”到凌晨3点。最近他正在研制的一件产品是激光炮，这个创意同样来自一部动漫片——变形金刚。

在把创意变成作品的过程中，遇到问题，胡睿博他们会求助于学校的老师，学校的实验室也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应有尽有华强北市场、校门外的小五金店也成了这些小创客们经常光顾的场所。除了技

术问题，这些小创客们也在关注市场，“市场调研、初次产品、二次产品、打印测试”，这些专业创客们常用的术语，他们讲起来也头头是道。

创客空间成立一年来，来这里参加过活动的学生已有300多人。

“在课堂上，我们更多的是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在创客空间，是我们自己提出想法，然后自己想办法去实现，碰到问题，也是我们自己去查资料、想办法慢慢解决”。胡睿博的感受也得到了深圳中学初中部副校长韩晓宏的认同，学生们在创客空间展现出来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都让他刮目相看。

记者了解到，随着创客概念的兴起和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浪潮袭来，除了深圳中学初中部，目前，已有深圳第二高级中学等多所中小学已经成立或正在组建校内的创客空间。

对于创客文化在校园引发的热潮，深圳教育界一位人士表示，创客空间是一个自主、开放的空间，学生们在这里学习和探索，加上老师的技术和设备支持，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培养他们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但切忌把孩子们的创客活动变成一种标准化的应试教育，那就会失去创客的本来意义”。

马上就要上初三了，面对中考的压力，胡睿博和他的创业小伙伴们已经答应家长，要减少到创客空间活动的时间。胡睿博说，创办星火创客中心的经历会让他终身受益。在创客节上，他还代表星火创客空间向全市中学生发出倡议，倡导深圳市各中学都成立自己的创客空间，让创客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到底能不能“体面地做公益”

在上海，2005年至2007年浦东新区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累计达1.24亿元；2010年上海各级政府通过购买服务、补助等形式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37.89亿元，2011年更达到41.02亿元。

一大批社会组织在这一爆发式投入中获得生存发展的土壤。然而，在对数十家公益机构负责人访谈后，童潇却得出了一个并不怎么乐观的结论，“过个5年，你说他的机构会死，可能也不至于；但你说这个机构能有多大的发展，我也未必”。

太多的因素制约着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人才”。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没有好的工资收入，招不来优秀的人才。

上海厚天减灾救援公益促进中心常务理事严晓，特别希望能让自己手下那些从特种救援队、反恐反劫机队出来的专家能“体面地”做公益。他坚持给他们配备不低于专业安保人员的薪资收入，但即便如此，收入最高者也只有8000元左右的月薪，与专业安保人员动辄上万的月薪仍有差距。

好几次，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些“好苗子”去当了保安。“他们在这里我可以去发挥特长、做最专业的的事，但做保安工资高”。为了控制成本，严晓只能给自己的员工按照最低标准缴纳五险一金。

他希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时，能适当提高购买经费；针对民非机构参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税收，能适当减免。如此双管齐下，以提高专业民非机构的员工收入水平。

童潇告诉记者，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因为大多数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并不认为应该多花一些钱来购买专业服务。因为普通老百姓总是觉得，公益机构“就不该要钱”。

就在不久前，孙冰向一名从北京过来考察工作的领导汇报，说自己想把向阳花做成一个社会企业，以此来“体面地做公益”。但这一想法却并未得到支持，对方委婉地提醒他，“你们既然做公益，就不要老想着挣钱”。

政府和青年社会组织如何相处

以童潇目前对沪上青年社会的了解，这些组织总是遇到发展障碍早就成为



《北京青年大型调查》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 黄丹丹

今年4月，一个名为“在校中”的校园O2O平台，引起了俞敏洪等投资人的兴趣，获得了洪泰、英诺基金和北软天使基金的千万Pre-A轮融资。这个问世短短3个多月的“校园电商服务商”，目前已经吸引了两万多名付费用户。

创始人祝正亮觉得，“在校中”之所以有了今天的成绩，团北京市委功不可没。

拒绝“娱乐化”，培训要“干货”

一不小心，祝正亮就“走在了时代前头”。2012年，他连护照都准备好正要出国，移动互联网行业异军突起。为了抢占“乱世出英雄”的先机，祝正亮果断决定休学创业。“那时候教育部可还没有出台允许休学创业的规定。”他笑道，“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1级研究生，现在还在休学”。

创业初期，祝正亮也遭遇了不少“滑铁卢”，如今回想起来，他发现“有些项目从出生就注定了死亡”。

祝正亮曾经“驻扎”过几个创业孵化

器，也参加过不少创业培训，却发现“对自己没什么帮助”。所以，当被推荐参加共青团北京市委和某孵化器联合组织的“创业面对面”活动时，他心里是抗拒的。

来到现场，祝正亮却发现，这个活动和自己以往参加的活动“不太一样”。“小范围圆桌，人不多，大家都得参与，提问或者发表意见。不是那种一大堆人、听完就走的培训”。

在这次活动中，祝正亮找到了两个合作伙伴，还认识了团北京市委事业部副部长郁中华。一开始，他觉得郁中华一定会跟他“打官腔、走过场”，出乎他意料的是，郁中华后来一直主动和他保持联系，为他提供信息、对接资源。“这次能得到投资，也是因为郁部长大力向俞敏洪推荐我们。”他笑道，“后来在好几个孵化器组织的活动里都见过郁部长，才知道团市委和这些组织都有合作”。

从参加那次活动开始，祝正亮就成了团北京市委的忠实“粉丝”。最让他满意的是，团北京市委组织的活动常常“有私密性、有针对性”，避免了不同领域的人聊天时“驴唇不对马嘴”的尴尬，避免“娱乐化”。他在活动中找到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每次都拎到许多“干货”。

2014年以来，团北京市委组织开展了北京青年创业训练营、北京青年创业面对面、北京青年创业政策大讲堂等一系列活动，通过活动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引导

团北京市委扶持青年创业有落点

在这里，不怕创业“不靠谱”

社会力量共同为青年搭建“创业生态圈”。去年一年，共开展了500余场青年创业活动，每个月都有一期活动“地图”海报。

入驻创业园，“不靠谱”也没问题

一面墙上挂着黑色的“CHEERS”字母，另一面墙上错落排列着黑色和白色的衣架，落地窗边是布艺沙发和绿色植物。工作台上的白色缝纫机告诉你，这是一间“裁缝铺”。

“裁缝铺”位于昌平区的北京青年创业示范园。在这里，王辰晨拥有一间66平米的独立办公室，每年租金不到3万元，“想怎么装修都行”，还提供每平方米60元的装修补贴。

目前，北京市已有11家青年创业园区，由团北京市委通过自建、与政府职能部门合建、与社会企业合作等形式建立，共有孵化场地6万余平方米，孵化企业千余家，带动就业万余人。

去年8月，王辰晨的公司注册成功。这个名为“CHEERS”的在线时装设计平台是一个试图“改善用户服装网购体验”的产品。普通用户可以自己设计服装款式，选择面料、花色，然后输入身体数据，下单定制成衣。设计师用户则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通过类似众筹的方式，实现设计师品牌的孵化。成衣的销售利润还将部分回馈给设计师。

这个听起来“不靠谱”的项目，已

经完成了线下储备，进入系统开发阶段。目前，团队11名成员都在“无偿劳动”。为了养活自己，部分前期任务不重的成员选择暂时兼职。“虽然不是正常的模式，但大家的感情就像家人。有其他工作的小伙伴会帮助全职做项目的同学，解决基本生存问题，让我们能专心干活儿。”王辰晨笑道。

虽然现状看起来有些“窘迫”，王辰晨还是执意拒绝了許多“意义不大”的投资，靠参加创业大赛得到的十几万元奖金维持公司的运转。

2014年，团北京市委联合市人社局、科委、农委、经济信息化委、中关村管委会等多家政府职能部门，与津冀团青组织合作，共同举办了“联东U谷杯”首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统筹数十家社会支持媒体、服务机构、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孵化园区资源。全市共有1254名创业青年报名，806个实体创业项目参赛。在这场比赛中，王辰晨拿到了第五名。

比赛的最大赢家张小青来自山东青岛。在换了4份工作后，她创办了自己的机电设备公司。2013年，张小青又成立了北京圣源宝节能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通过北京山东企业商会推荐报名，张小青带着公司自主研发的“SYBF防垢除垢仪项目”参加了“联东U谷杯”。SYBF防垢除垢仪项目主要应用在热力、热电、高校等工业和民用二次水系统的换热设备

“常态”了。

限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是有些政府机构不能对社会组织“一视同仁”，“由体制内人士自己搞的社会组织高看一眼，在我这里发育成长的社会组织高看一眼，既非体制内又非本地的社会组织弱势一些”；二是个别政府机构购买服务行为不规范，“今天买了他家的服务，明天领导换了，就不买了，签了协议的还能反悔”。

对于后一个问题，童潇尤其不解，“签了协议的事情，作为政府部门就应该履行，政府可以说话不算话吗？”

但在公益机构负责人那里，“被毁约”这样的事，他们却作出了“淡定豁达”的姿态。“这很正常，政府总是飘过的，换一个领导不想让你做，这是正常的事，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难道你还去打行政诉讼官司？除非你以后不想干了。”一名公益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上海市的区级层面，经过招投标的购买服务项目一般不会出现“毁约”的情况，但在下面的街道、社区，“毁约”事件并不鲜见。

对此，童潇认为，在目前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尚不平等、社会组织尚处弱势的情况下，还是应当制定一套相对稳定的基层治理制度，“制度给他固化下来，换哪个领导都不能改”。

这对上海的基层治理尤为重要。就在今年年初，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就要求全市所有街道“全部停止招商引资”，并将工作重心转移至“管理、服务”，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将是“动员社会参与”。

如果没有一套稳定、完备的制度保障，“动员社会参与”或将只是文件中的一行黑字而已。

最近，童潇正配合上海市民政局一起制定“上海十三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他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向民政部门建议，对基层街道的考核方式进行一些“微调”——考核本地区培养了多少社会组织的同时，也考核该地区引进了多少优秀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鼓励基层街道用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来”社会组织；基层社会治理，应当走一条法制化的道路，基层政府“说了算，要算数”。

对于“是否全部招投标”规范购买服务流程的问题，童潇建议采取两种方式。小项目，可以免去招投标的繁琐手续；大项目，要招投标，但对那些连续3-5年度考核优秀的社会组织，可以尝试一次性签约服务5-10年。据悉，上海目前大多数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合约期限都为一年。

中建八局团组织传播“绿色施工”理念 花园式建筑工地可否复制

本报记者 崔玉娟

土方车离开建筑工地先封闭，然后“走红毯”，最后再喷淋，直到监督人员检查合格，才能离开工地。这是中建八局在北京电科太极信息产业园项目工地上已经运用成熟的一套方法。项目负责人魏钦玺表示，经过这样的处理，离开工地的车能够保证没有扬尘。

在这个工地，路面是可移动的透水砖，围墙是装配式、可循环利用，垃圾统一封闭管理……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实现绿色施工的目标。

2002年以来，中建八局展开了绿色施工的相关研究与实践，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廖鲜明回忆，在山东省某项目中，施工队伍几乎做到建筑垃圾排放。建筑废料等直接在工地内集中到地下一层，重新进行加工，制作成合格的建筑材料循环利用。

类似的经验在中建八局几年的实践中积累了很多，但是，投入也是巨大的。这样的模式可否复制？

魏钦玺在项目开工前测算时也吓了一跳，北京电科太极信息产业园项目在绿色施工方面的投入至少是500万元。除了环保设施方面的投入，还有很多隐性成本的增加。以土方车为例，现在一般的公司一车运送20立方米运料，为了不产生扬尘，把土方车封闭，一车只能运10立方运料。很多公司不愿意做这个生意，公司只能提高价格，从原来的每立方米30多元提高到现在的每立方米70多元，这还不算对车辆本身的改装。

但是，魏钦玺还是有信心通过3个项目的运作把这方面的成本摊平。“2013年一个项目结束的时候，拆临时路面就花了38万元，仅破碎就花了10万元。”根据魏钦玺的测算，现在绿色施工的投入，在每个项目损失10%，因为可以循环利用，反而减少了浪费。这样的理念也为中建八局赢得了市场认可。“我们现在用的集成板房，直接运到一个项目就能用，减少了拆装带来的损耗”。

廖鲜明表示，中建八局在绿色施工上的实践推动了施工现场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企业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改善了施工现场作业条件，提升了施工企业的职业形象。

日前，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团委书记在北京某商业广场举办“穹顶之下”护国蓝天“中建八局与你同行”公益活动，宣传绿色施工的理念，向公众发放口罩等。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工会副主席、政工部副部长冯小林出席活动。他们相信，绿色施工理念定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肯定和关注。

4月23日，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镇甘宜村，来自国网余姚市供电公司梁弄供电所的志愿者们看望92岁高龄的抗战老兵姚长根，并为老人检查室内线路，确保用电安全。

近期，当地供电部门积极开展“关爱抗战老兵”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在全市范围找到60余名抗战老兵，组织开展“余姚抗战老兵走进国家电网”、“台区经理上门服务抗战老兵”等活动，为老兵们当好贴心水电保姆。

本报记者 李建泉/摄

